

01 | 政治认知与
历史变迁

Political Cognitio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Volume 1, Number 1, 2014

世界历史评论

The World Historical Review

陈恒 洪庆明 主编



近代早期欧洲的“生活周期假

古希腊演说与雅典民众政治认

“夏后氏之苗裔”：匈奴祖源神话及其创造的历史情境

延续与断裂：启蒙运动时期到 19 世纪欧洲史学的转变

20 世纪历史哲学中的兰克形象

古代文明研究前沿问题与方法

《林多斯碑》译注

俞金尧

李尚君

徐晓旭

刘耀春

吕和应

晏绍祥、金寿福、黄洋、张巍、裔昭印、陈恒

张强

文
景

世界历史评论

The World Historical Review

陈恒 洪庆明 主编

01 | 政治认知与
历史变迁

Political Cognitio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Volume 1, Number 1,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认知与历史变迁 / 陈恒, 洪庆明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世界历史评论)
ISBN 978-7-208-12481-3

I. ①政… II. ①陈… ②洪… III.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6054 号

责任编辑 马晓玲
封扉设计 园里



政治认知与历史变迁
陈恒 洪庆明 主编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制版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20毫米 1/16
印张 19.5
插页 2
字数 260,000
版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481-3/K·2268
定价 45.00元

发刊词

在中国世界史学界诸多同仁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世界历史评论》终于面世了,谨此向本刊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需要更广、更深地了解世界。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政治沟通、经济往来、文化交流,还是个人层面的贸易、投资、旅游,都需要熟悉各国各地区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惟其如此,才能知己知彼,进而在具体事务中形成正确的认识、作出理性的选择。有鉴于此,我们希望《世界历史评论》能够成为越来越多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深层次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

经过数十年发展,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世界史上升为一级学科更为世界史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巨大潜能和动力。伴随着相关学术机构学科建设的持续累进,世界史研究学者的队伍日益扩大,研究范围不断扩展,学者间的交流也日益增多。有鉴于此,我们希望《世界历史评论》能够成为世界史研究者们学术交流、互动的另一座平台。

人类文明过去的一切都是历史。但由于现代学科与专业的细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历史”:文学史、哲学史、宗教史、艺术史、经济史、法律史、政治史、社会史……这些“历史”,每一门都意味着研究视野和方法路径的分殊。借用法国《年鉴》杂志的话来说,“如果每个研究者在践行合法的专业化,辛勤地耕作自己的园地之时,关注一下邻人的工作,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有鉴于此,我们还希望《世界历史评论》能够成为学界

同仁跨学科思想碰撞与沟通的媒介。

《世界历史评论》是发表国内外世界史研究重要成果的学术刊物。她将在尽可能广阔的领域里探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并以历史的视角，通过扎实可靠的材料、理论方法的创新、自由的思考和探索，向读者显现一个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的世界。在此，我们将秉承宗旨，并始终怀着虔敬之情，对待任何拥有自己精神与个性的佳作。

希望的种子刚刚播下，成长尚需时日与阳光，我们将勉力而为，并热切期待得到广大学界同仁的帮助扶持。

编者

2014年5月20日

目 录

专 论 / Research Articles

- | | | |
|-----|------------|---|
| 003 | 李尚君 | 古希腊演说与雅典民众政治认知
——以腓罗克拉底和约为例 |
| 027 | 杨 军 | 论犹太教历史感的发生 |
| 042 | 徐晓旭 | “夏后氏之苗裔”：匈奴祖源神话及其创造的历史情境 |
| 057 | 肖 超 | 西方史学中一种新范型“基督教史学”的确立
——围绕攸西比乌斯《教会史》的思考 |
| 077 | 俞金尧 | 近代早期欧洲的“生活周期佣人”研究 |
| 114 | 刘耀春 | 延续与断裂：启蒙运动时期到 19 世纪欧洲史学的转变 |
| 133 | 吕和应 | 20 世纪历史哲学中的兰克形象 |
| 151 | 辛兆义
董小川 | 美国对外文化事务机构的历史变迁 |

评论 / Review Articles

- 19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
2013 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综述
- 233 洪庆明 18 世纪法国思想气候的转变与革命起源
——读莫尔内《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

专题论坛 / Forum

- 247 晏绍祥 金寿福 黄 洋 张 巍 裔昭印 陈 恒
古代文明研究前沿问题与方法

文献与史料 / Sources and Documents

- 267 张 强 《林多斯碑》译注
- 290 李晓东 因泰甫石碑铭文译注
李慧雪
- 301 Contents and Abstracts

专论 | Research Articles

古希腊演说与雅典民众政治认知

——以腓罗克拉底和约为例^①

李尚君

摘要：本文通过对有关腓罗克拉底和约的古希腊演说辞进行个案研究，考察雅典民主制度中演说如何对民众政治认知发挥影响。首先，公民大会演说和法庭演说共同构成一种持续的动态过程，作为民众获取信息并形成政治认知的主要渠道。其次，政治家在演说中会诉求于民众的集体记忆，并且通过所谓的集体记忆来重塑民众对政治事件的认知。再者，演说在呈现政治事件的经过和评价其性质时采取模式化的形式，并使之成为一种确定的衡量标准。这种模式化的呈现方式与民众的集体记忆相结合，它一旦为后者所认可，也就意味着民众不仅接受了政治家所提供的相关政治信息，同时也接受了他所建构的这种衡量标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民众形成特定的政治认知，从而影响民众对政治事务的判断和对城邦政策的选择。

关键词：德谟斯提尼 雅典民主政治 集体记忆 演说术

20 世纪 80 年代，芬利（M. I. Finley）在描述雅典民主制运作时，曾经关

^① 本文为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古希腊政治演说研究”（项目编号：13YS043）阶段性成果；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阶段性成果。

注过政治认知的问题，他结合古希腊社会特征，从宏观层面上讨论了政治商议和决策过程中信息的获得与交流方式，但是对于演说在这方面的作用似乎并未给出积极评价。^①随着古希腊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演说不仅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会现实。于是，演说本身的社会功能成为考察重点。在此趋势影响下，赫斯克（Jon Hesk）的《欺骗与古典时期的雅典民主制》（*Deception and Democracy in Classical Athens*）一书于2000年问世，以崭新视角对古希腊演说中的“欺骗”问题给予了严肃的学术关注。作者指出，演说术一方面作为欺骗手段遭到揭露与批评，另一方面却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捍卫真实和正义的作用。该书尽管没有对演说传播政治信息的具体方式进行细致分析，但已经开始从认知的角度关注古希腊演说的社会功能。数年之后，欧博尔（Josiah Ober）在其专著《民主与知识：古典时期雅典的创新与学习》（*Democracy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in Classical Athens*）中将公共知识作为研究主题，更完全地将研究视线转向认知层面。该书强调民主政治对社会整体所产生的普遍作用，重点在于考察雅典民主政治如何整合、传播并利用社会的公共知识。为此，他讨论了雅典民主政治多方面的具体运作形式，其中自然包括公民大会与公民法庭这两个重要的政治演说场合，并且特别对吕库古斯（Lycurgus）的诉讼演说辞《诉列奥克拉特》（*Against Leocrates*）进行了个案分析，说明信息是怎样通过法庭的诉讼演说而得以向公众呈现的，进而从公共知识的角度重新审视民众的政治参与情况。

有鉴于此，为了进一步考察雅典民主制度中的政治家如何利用演说影响民众对政治事务的认知，有必要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在检视古希腊演说辞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德谟斯提尼有关腓罗克拉底和约（Peace of Philocrates）的演说内容不失为颇具价值的分析对象。所谓腓罗克拉底和约，是“第三次神圣战争”的结果。该战争起因于公元前356年弗基斯（Phocis）

^① 芬利以推测的口吻，讨论了在公民大会演说之外的其他场合中，政治家和民众是如何获得并交流信息的，并且指出，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并非只是“修辞技巧的持续竞赛”。（M. I. 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79-83）

对德尔斐的占领，其间，马其顿的腓力二世乘机插手中南部希腊事务，支持忒拜攻打弗基斯，而雅典则站在弗基斯一方，对抗马其顿。公元前346年，腓力二世与雅典人订立腓罗克拉底和约，借此控制温泉关，威胁中南部希腊。这成为雅典与马其顿外交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德谟斯提尼从此开始逐步推行坚决的反马其顿政策。为了说服民众接受这一主张，他在后来的演说中一再将该和约作为关键例证加以渲染，引导民众回顾其经过，判断其是非，反思其意义，形成特定的政治认知。他的相关阐述主要集中于公元前343年的《使团辞》（*On the False Embassy*）和公元前330年的《金冠辞》（*On the Crown*）之中；而政敌埃斯基尼斯（Aeschines）也曾就此和约与德谟斯提尼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有演说辞存世，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佐证。笔者将通过对这些演说内容的文本分析，从动态过程、集体记忆和模式化叙述三个方面，考察演说对民众政治认知的影响，以期更为具体而生动地阐释古希腊演说的社会功能以及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

一、动态的认知过程

演说是雅典政治家的职责，也是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德谟斯提尼曾经提出：政治家应该如何接受审查（*hōng' an ho rhētōr hupeuthunos eiē*）？^①原文中 *rhētōr* 一词本义是“演说家”，这里则特指政治家，*hupeuthunos* 是由前缀 *hupo-* 与 *euthuna*（审查）构成的形容词，意思是“有必要接受审查”，其中的“审查”（*euthuna*）是雅典城邦专门针对各类公职人员在卸任时进行的述职审查。但是，*rhētōr* 并非一种公职，在制度上也不存在针对 *rhētōr* 的述职审查，^②德谟斯提尼的表述其实是在考问政治家的公共职责。他自己给出了答案：对政治家述职审查的标准在于“了解那些刚发生的事务，提前认识

① Demosthenes 18 (*On the Crown*), 246.

② 尽管针对政治家的述职审查是没有制度规定的，但是，作为某项公民大会法令提议者的政治家往往还会成为该法令的执行人，比如，在雅典对马其顿的外交事务中，德谟斯提尼等人的提议被民众表决通过后，他们本人又被指派为使节。这时，雅典城邦就会要求他们在完成任务之后接受专门针对使节的述职审查。

它们并提前讲给别人”。^①通常情况下，针对政治家的公共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这种所谓“述职审查”的作用。^②德谟斯提尼在公元前330年的一次公共诉讼中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申辩，特别强调了演说方面的能力与贡献，反复声明自己了解事实真相和腓力二世的实力，并将信息传达给民众，有助于他们探讨公共事务，以及获得“有关城邦未来政治生活的经验”。^③这也就是政治家在演说中必须履行的义务，他们有责任将自己了解的信息传播给民众，并使之形成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治认知。而围绕演说的“述职审查”不仅会审视政治家的演说对民众认识相关政治事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反思民众从中所形成的政治认知是否合理，它还试图对这种既有的政治认知予以补充、修正乃至重塑。因此，政治家的演说与所谓的“述职审查”先后发挥作用，在持续的动态过程中共同构成了民众认知政治事务的主要途径。

公元前343年，德谟斯提尼就腓罗克拉底和约指控埃斯基尼斯的公共诉讼无疑是最能集中反映这一动态过程的案例。在起诉演说《使团辞》中，德谟斯提尼指出：埃斯基尼斯要以公民大会演说者的身份（*tōn en tōi dēmōi legontōn*）接受“述职审查”（*euthunas hupheksei*），因为雅典的“政体是建立在演说之中的”（*en logois he politeia*），说谎（*pseudē legōn*）是对民众犯下的最大罪行，如果演说不是真实的（*mē alētheis*），民众就“无法安全地参与政治活动”（*asphalōs ... politeuesthai*）。^④正是在此意义上，德谟斯提尼向

① Demosthenes 18 (*On the Crown*), 246.

② 古典时期雅典的公共诉讼（*graphē*），是指因为危机城邦公共利益的行为而对某人提起的诉讼，在针对政治家的公共诉讼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就是“违法提议”案件（*graphē paranomōn*），这是对公民大会提议者所提起的指控，认为其提议违反了雅典法律（*nomoi*），我们可以将这类公共诉讼视为对政治家公民大会提议演说的最直接制约。关于“违法提议”诉讼以及针对各类公职人员的述职审查（*euthuna*），详见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Structure, Principles and Ideology*, Oxford: Blackwell, 1991, pp. 208-212, pp. 222-224. 另外，在存世演说辞中多次出现关于法律严禁政治家欺骗民众的说法，例如：Demosthenes 20 (*Against Leptines*), 100, 135; Demosthenes 49 (*Against Timotheus*), 67. 赫斯克于是讨论了是否存在这类专门的诉讼程序的问题，他认为，演说辞中有关这类法律的说法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是一种修辞性的表述方式，是在民主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对政治家演说行为的制约，以及对民众权威的强调，同时也在提醒民众警惕政治家对民众权威的潜在威胁。见 Jon Hesk, *Deception and Democracy in Classical Athe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51-57.

③ Demosthenes 18 (*On the Crown*), 144, 173.

④ Demosthenes 19 (*On the False Embassy*), 182, 184.

埃斯基尼斯提出了质问：“你汇报了什么？如果讲了真话，就让你活；如果说了谎，你就要接受审判。”^①可见，此次诉讼将对埃斯基尼斯过去的公民大会演说进行审查，回顾演说的内容及其对民众政治认知的影响；同时，此次起诉演说本身也成为德谟斯提尼用以改变民众既有政治认知的工具。于是，从公民大会演说到公共诉讼演说，便形成一种动态过程，而《使团辞》则呈现了其中一个“横截面”，使我们得以清楚地看到，后来的诉讼演说是如何回顾和审视之前的公民大会演说，从而在这一动态过程中不断重塑民众政治认知的。

依据演说辞陈述，最初在腓罗克拉底的斡旋与提议之下，雅典人决定与腓力二世磋商和约，德谟斯提尼和埃斯基尼斯共同参加了出使马其顿的第一次使团，又称“和平使团”。使团返回后，雅典人于当年埃拉菲博里翁月（*Elaphēboliōn*）18、19日先后召开两次公民大会，商议并通过了和约。^②而后，于同月25日由雅典盟邦在公民大会上对和约进行宣誓。接下来，德谟斯提尼与埃斯基尼斯又共同参加第二次使团，前往马其顿获取腓力二世的宣誓，因此又称“誓言使团”。使团返回雅典后，于斯基罗佛里翁月（*Skirophoriōn*）15、16两日先后在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中进行汇报。^③

以上便是制定该和约的主要步骤，发生于公元前346年。从中可见，该和约的制定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外交与政治事件，涉及多次公民大会商议过程。三年后，德谟斯提尼在《使团辞》中指控埃斯基尼斯出使马其顿期间收受贿赂，却将攻击重点集中于被告的公民大会演说。演说一开始就声明，指控针对的其实是埃斯基尼斯“在城邦政治活动中的地位”，这既包括他的所作所为，也包括他的公民大会演说（*tois pepragmenois kai dedēmēgorēmenois*），尤其是他针对腓力二世的演说（*logous kata tou Philippou dēmēgorein*）。^④

① Demosthenes 19 (*On the False Embassy*), 82.

② 埃拉菲博里翁月是雅典历法的第九个月，相当于现在公历的3月中旬到4月中旬。

③ 斯基罗佛里翁月是雅典历法的第十二个月，相当于现在公历的6月中旬到7月中旬。

④ Demosthenes 19 (*On the False Embassy*), 9.

《使团辞》第 10 和 11 两节用五个并列的分词结构列举了埃斯基尼斯在参加“和平使团”之前的一系列政治行为：在公民大会演说中宣称，最早识破腓力二世；与伊珊德（Ischander）一同在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中进行演说^①；说服雅典人派遣使团，准备对腓力二世的战争；出使阿卡迪亚（Arcadia）返回雅典后，复述自己在阿卡迪亚的演说；批评那些受到腓力二世贿赂的希腊人，备陈他们所造成的危害。显然，这些行为都离不开演说，德谟斯提尼使用十分夸张的形容词将它们称为“他那些美好而宏大的演说”（*tous kalous ekeinous kai makrous logous*）。^②

据德谟斯提尼所说，埃斯基尼斯受贿是在跟随“和平使团”返回雅典之后被发现的，其证据依然是他在公民大会中的演说。《使团辞》第 13—16 节叙述埃拉非博里翁月 18 和 19 日先后两次公民大会的场景。第 14 节直接引用埃斯基尼斯的演说内容，并使用强调的修饰语来形容他的演说：将埃斯基尼斯 18 日的演说称为“他那些简洁而谦逊的演说”（*toioutous tinas brakheis kai metrious logous*），到 19 日却变为“无比该死的演说”（*pollōn akious thanatōn logous*），^③因为埃斯基尼斯一反之前的做法，转而危害雅典盟邦。在 14—16 节叙述完两次公民大会的经过之后，德谟斯提尼表示，将向听众讲述埃斯基尼斯在随后的“誓言使团”中如何拖延时间、损害雅典利益。但是，接下来的第 17 节却直接跨越到“誓言使团”返回雅典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即斯基罗佛里翁月 15 日在议事会和 16 日在公民大会中的演说经过。这一叙述延续到第 56 节，^④其中，第 17—24 节生动描述当时公民大会中的场景，第 45—46 节叙述德谟斯提尼在公民大会中与腓罗克拉底进行的辩论。随后第 57—63 节对以上叙述进行总结，详细列举前后的事件经过，指出明确的日期，目的

① 伊珊德是演员尼奥普托勒慕斯（Neoptolemus）之子，据《论和平》（*On the Peace*）的说法，尼奥普托勒慕斯曾被腓力二世收买，见 Demosthenes 5（*On the Peace*），6-8。

② Demosthenes 19（*On the False Embassy*），11。

③ Demosthenes 19（*On the False Embassy*），16。

④ 麦克道威尔（MacDowell）也注意到德谟斯提尼这种叙述顺序，并给出一定解释，见 Douglas M. MacDowell, ed., *Demosthenes: On the False Embassy (Oration 1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7-28。

在于证明埃斯基尼斯等人与腓力二世合谋毁灭了弗基斯。^①第 64—87 节集中谴责埃斯基尼斯的上述罪行，并强调他给雅典造成的危害。第 88—105 节对埃斯基尼斯将进行的申辩演说加以反驳。第 106—121 节证明埃斯基尼斯被腓力二世收买，与腓罗克拉底同谋。第 122 节以后围绕对埃斯基尼斯的判决要求进行雄辩，直到第 155 节才转回到“誓言使团”。这种叙述打乱了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而将前后的演说场景集中在一起，同样强化了德谟斯提尼对埃斯基尼斯政治演说的关注。

在第 17—24 节描述斯基罗佛里翁月 16 日的公民大会场景之后，第 25—28 节解释为什么要复述这次公民大会中埃斯基尼斯的演说，德谟斯提尼给出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埃斯基尼斯在演说中用虚假的许诺欺骗雅典民众，并且阻止其他人讲出“事实”（*talēthē*）；第二个原因则是要借此让雅典民众懂得怎样辨别埃斯基尼斯演说的真伪。第 29 节强调，要让“事实”（*pragmata*）胜过埃斯基尼斯的“名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名望”一词的古希腊语原文为 *doksa*，派生于动词 *dokeō*（认识），因此，*doksa* 的本义是名词性的“认识”，在这里指民众对埃斯基尼斯的认识，转义为“名望”，其实正是民众政治认知的组成部分。它在前面第 12 节中体现为：当埃斯基尼斯参加“和平使团”时，雅典民众将他视为监督者，而不是出卖雅典利益的人。德谟斯提尼提醒民众，正是由于埃斯基尼斯“以前进行的演说”（*tous proeirēmenous logous*），“你们所有人”才会持有这样的“认识”（*tēn doksan*）。在德谟斯提尼看来，这一“认识”不但会使民众相信埃斯基尼斯在“和平使团”中所扮演的角色，更会使民众进一步信赖埃斯基尼斯，相信他在公民大会演说中所传播的其他信息，以及那些所谓的许诺。为此，德谟斯提尼才认为有必要指导民众辨别埃斯基尼斯演说内容的真伪。换言之，民众关于政治家个人的“认识”可能影响着他们对其他政治信息的接受与判断，从而使这种“认识”延伸为内容更广泛的政治认知，这一过程同样是通过政治家的公民大会演说而得以实现的。

^① Demosthenes 19 (*On the False Embassy*), 60.

接下来，德谟斯提尼斥责埃斯基尼斯在斯基罗佛里翁月 16 日的公民大会上以欺骗手段妨碍民众了解“事实”，使得雅典人在最终得知腓力二世占领温泉关的消息时，已经难以决定如何采取行动了。在这里，德谟斯提尼特别阐发了民众在公民大会中进行政治商议的正当程序：先要“听取关于事实的演说”（*akousai peri tōn pragmatōn*），然后商议，进而“去做认为该做的事”（*prattein ho ti doksai*）。^①引文中 *doksai* 是动词 *dokeō*（认识）的不定式形式，表示民众在政治参与中的认知活动。这也就是说，了解“事实”（*pragmata*）是民众形成政治认知（*doksai*）并采取行动（*prattein*）的基本前提。德谟斯提尼指出，他本人曾在前一天向议事会说明实情，并提出自己对事态的预见。但是，议案却未能提交公民大会，民众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接受了埃斯基尼斯发布的虚假信息。其结果是，尽管雅典民众对腓力二世到达温泉关的消息感到震惊，并且为使节没有向他们汇报而气愤，但是他们仍然相信埃斯基尼斯所谓的许诺是能够实现的，因而拒绝听取德谟斯提尼的演说。德谟斯提尼进一步声明，如果在当天的公民大会上“真实”（*tēn alētheian*）得胜，他本来就可以立即提出反驳，向民众传达信息并且防止雅典民众错失采取行动的机会。然而，埃斯基尼斯却给出欺骗性的许诺，试图利用演说把雅典民众引向虚假的希望（*phenakisthēnai tois logois toutois*），同时阻止民众从德谟斯提尼这里听到实情（*talēthē mē ... akousai*）。^②

在以上这些叙述中，德谟斯提尼着重强调公民大会演说对民众政治认知的重要影响，突出他本人如何力争向民众及时传达“事实”，而埃斯基尼斯却在公民大会中用谎言排挤“事实”，控制政治信息的发布，主导民众对政治事务的认识与判断。实际上，公元前 346 年埃斯基尼斯成功说服民众接受腓罗克拉底和约，这表明民众当时在其演说影响下普遍认为该和约是正当而有益的，直到公元前 343 年，民众的想法很可能仍未改变，德谟斯提尼在诉讼中面对着民众多年前所形成的这种政治认知，并试图加以改变，为此，他回顾了当年公民大会的商议过程，聚焦于埃斯基尼斯的演说，以及他

① Demosthenes 19 (*On the False Embassy*), 34.

② Demosthenes 19 (*On the False Embassy*), 30-32, 35, 42-43.